

清季詩史中的戊戌維新

劉學照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十九世紀末發生的戊戌維新是一次愛國救亡的政治革新運動，也是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它的深刻影響不僅彪炳史冊，而且留韻詩壇。二十年前，筆者和同事為收集中國近代歷史詩歌，曾在包括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在內的北京、上海、天津、瀋陽、長春、西安等地十九家古籍收藏較豐的圖書館查閱了大量晚清詩集，發現其中詠及戊戌維新的詩什相當可觀，且多為各有關詩總集所未收，頗具史料價值。為紀念戊戌維新一百周年，筆者謹將所見有關吟什，特別是別見的部分，編合成篇，以為戊戌維新史料的一個補頁，從若干側面凸顯這場運動的原有面貌和深刻影響。

一、「遼臺靡靡割山河，抗章伏闕公車多」

戊戌維新運動的起點是1895年的「公車上書」事件，但其原委還可溯源到1888年12月康有為的第一次上皇帝書。康有為在〈感事〉詩中注稱「時馬江敗，詣闕上書請變法」，吟有「上帝清明闐闐開，紛紜抗議上雲臺」、「治安一策知難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等詩句，¹稱頌皇帝「清明」，表示自己不因上書未達而灰心。大概是由於這次事件未產生多大實際影響，所以在眾多清季詩集中未再看到有其他類似的記詠。

甲午中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老大中國被經過維新的東鄰日本戰敗，產生了強烈的歷史震撼，它在洋務運動中孕育起來的維新思想迅速升華，發展成為一場愛國救亡的維新變法運動。〈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北京，遂發生了要求拒和、遷都、變法的公車上書事件。這次上書雖又未能上達，但很快「刻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江蘇丹徒戴啟文有〈讀《公車上書記》〉一首，詩前有序：「夏初和議將成，適會闐試畢，直省舉子千三百餘人集議，以廣東康孝廉長素主稿，草疏萬八千字，力言目前戰守之方，他日自強之道。文甫成而議已定，不及上陳，事遂中寢。原稿印行，讀之憮然。」詩曰：

¹ 康有為：《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8。

一萬八千字，讀之含古芬。精誠泣鬼神，大筆挾風雲。蒿目憫時事，同心成至文。諫書雖未上，此草忍輕焚。²

此詩以淺顯的筆韻記詠了事件始末並肯定了事件本身的價值。

另外，江蘇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朱廣堯有〈讀《公車上書記》有感〉一首；³山東萊陽王丕煦有〈公車上書記事(乙未三月)〉二首：

批鱗長鳳名猶在，嘔血陳東論不刊。漢宋英風出太學，而今沆瀣到春官。(其一)

遷都決戰一驚鳴，紙上談兵寫不平。可嘆百年興禮樂，頭巾陋絕魯諸生(時大會於松筠庵，傳觀書稿，內有遷都之議。魯籍公車多以為非策，不肯署名)。(其二)⁴

其中批鱗，即批逆鱗或謂嬰鱗，比喻臣下敢於直諫觸犯君主。春官，指作禮部的通稱。詩意稱讚陳東等漢、宋太學生敢於直諫而留芳於世，慶幸這種好的士風已流傳到現今參加禮部試的舉人。其二則記詠了山東公車因反對「遷都之議」而「不肯署名」，詩人對自己老鄉充滿儒生的固陋表示不滿。

康有為也有詩記詠這次事件，其中有「海東龍泣艦沉波，上相輶軒出議和。遼東膻膻割山河，抗章伏闕公車多。連名三千轂相摩，聯軫五里塞巷過」等詩句，⁵詠及公車們對遼東、臺灣等肥美國土被割去的無比憤懣，以及他們爭相赴會並在萬言書上署名的熱烈場面。「連名三千」是康的號稱。一般記載通稱合十八省舉人一千三百人連名。據光緒乙未上海石印書局石印本《公車上書記》所附名錄，僅六百零三人，分屬十六省，山東、河南未與。蓋初集人多，旋聞「和約」已成而「渙散」，乃至數百人「取回知單」。⁶王丕煦詩中的記詠對情況的變化，特別是山東不與的原因，提供了佐證。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在詩壇所引起的震動，除在黃遵憲、丘逢甲等人的詩集和阿英所編有關文學專集中有強烈的反應外，在一些散見的時人詩什中也有許多不平之音。如一位小京官、江西吉安曾炎權在〈日本和議成聞之愴然涕下呈同館諸公〉中吟詠道：「海風動馬關，淒涼銷兵器。……忍辱割遼臺，犒師傷重費。威旅許駐軍，通商遍內地。咽喉與腹心，自甘輕委棄。倭約實狡黠，從此益陰覲。列強況虎

² 戴啟文：《招隱山房詩鈔》，宣統元年(1909)刊本，〈新安遊草〉卷下。

³ 朱廣堯：《徵遠堂遺稿》，丙辰年(1914)刊本，〈涇南詩稿〉卷中，頁二十二。

⁴ 王丕煦：《韜毅詩存》，民國初鉛印本，卷一，頁六。

⁵ 《萬木草堂詩集》，頁61。

⁶ 參見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增訂本)，上編，頁30；下編，頁687。

視，要挾恐援例。俎上肉雖多，豈能盡俯媚。……請看宋南渡，失策在和議。」⁷ 詩人對戰敗屈辱和所造成的危局不勝痛心和擔憂。另如浙江寧波士人陸廷黻作〈乙未四月望日生日感事示崇實書院及門諸子〉一首：

甲子平頭又一年，生逢四月月初圓。忽聞和議成盟約，彌覺憂心迫沸煎。誤國何人甘割地，救時無術可回天。正當生日還祈死，戮力中原望後賢。⁸

與他友善的僧敬安作也和詩一首，吟詠道：「相逢莫話永嘉年，痛哭金甌缺不圓。佛眼亦因坐劫閉，禪心如滾油煎。」⁹ 一位教書先生過生日，聽聞訂立屈辱條約的消息深感痛心疾首，連和尚朋友也感「禪心」如「煎」。這態度與去年那拉氏明知已「三軍敗績，割地求和」還要「萬壽無疆，普天同慶」相比，實在是兩種不同的情懷。

〈馬關條約〉所割讓的遼東因「三國干涉」得以「贖回」，但臺灣很快被日本佔領了。所以時人的詩什中不乏哀嘆臺灣的吟詠。安徽壽州（今壽縣）方希孟在丙申年（1896）有〈贈臺灣歌者〉一首：

玉蝶羅衫金縷裳，蠻鞋猶是舊時妝。一聲唱到家山破，雙淚東流望故鄉。¹⁰

江西曾炎權在〈哀臺灣〉中作這樣的發問：「珠崖一朝忽復棄，海防疏虞誰靖邊？……臺客有家歸未得，海上流寓何年還？」¹¹ 福建霞浦吳壽坤在〈題臺灣全圖後〉中有如此的感慨：

二百餘年隸版章，赤嵌絕島擁閩疆。幾經又斬蠶叢關，不料銷沉鶴化忙。沃址於今淪異域，孤軍何以挫雄鉞。深虞得隴還思蜀，東望扶桑正耀芒。¹²

詩人眼見寶島淪喪、臺胞流落、日本勢盛而國運岌危，不勝殷憂之感。

「馬關脅約恥難忘，深痛何堪此鉅創？」中國是一個內向傳統很深的國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內省意識比較強。經過公車上書事件之後，士人中激發起來的民族意識轉化為對洋務運動的反思和「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變法自強思想。上海貢生秦榮光有竹枝詞〈機器局〉一首：「卅年求富更求強，造炮成船法仿洋。海面未收功一戰，總歸虛牝擲金黃。」何桂林在〈秋感〉一詩中更為憤慨：「廿年防海知無補，此恨空教付水流！」雲南石屏籍京官、後曾參加保國會的袁嘉穀在丙申年〈邊警〉一詩中有

7 曾炎權：《蘆廬詩鈔》，1912年刻本，卷二，頁十。

8 陸廷黻：《鎮亭山房詩集》，卷十，頁四。

9 同上注，頁二十一。

10 方希孟：《息園詩存》，民國八年（1919）鉛印本，卷七，頁十六。

11 《蘆廬詩鈔》，頁六。

12 吳壽坤：《讀我書室詩存》，卷下，頁二十。

這樣的吟詠：「千載國計計強富，富強不愁國日蹙。……何日勝算操博局，……杞人憂淚紛成行。」貴州遵義黎汝謙在〈讀史有感〉中寫道：「十數年間八表安，寰海無波號全盛。太平歲久侈心生，三海樓臺朱碧竟。國帑更濟實官錢，海軍報效尤捷徑。」他在〈書事〉中更慨然地責問：「內政自不修，外患何由平？……此咎將安歸，伊誰秉國成。」¹³

「風會特開千古局，車書真見萬方同」。黎汝謙另在〈書事〉的一首中還這樣吟詠道：

五洲千百國，於古不相通。一自道咸來，締交兼合縱。輪舟來若織，寰海遂同風。儼如古戰國，五伯遞七雄。各各務富強，精究兵與農。學校密如林，十九習商工。靜時務吸取，動時務戰攻。而我號神州，地大物又豐。泥古守成法，勢窮不變通。文士試八比，武夫極刀弓。……蕞爾倭奴國，天若誘其衷。一洗舊規模，力追泰西踪。倏忽二十年，毛羽遂豐隆。治國猶治家，衰盛乃自躬。……皇天本無私，道在人能弘。尚思英雄人，引手起孱慵。

黎汝謙是黎庶昌的侄子，曾以揀選知縣於光緒八至十年(1882-1884)間任駐日本神戶兼大阪領事(理事)，對中國值逢「千古變局」和中日政況反差強烈頗有感受，故能對中國政事守舊腐敗作出尖銳的批評。另外，湖南邵陽士人魏繇在乙未年(1895)寫了〈搏桑〉五首，用「搏桑初日曉曛曛」句開頭，中有「漫誇渤海千軍壯，終瀆長崎萬馬風」句，以「一說紛紜無再誤，臣工勤勉莫婆婆」句結尾。搏桑，即扶桑，指稱日本。魏繇是魏源的孫子，與陳三立友善。陳給他的贈詩中有「爾祖聲名煥日星」之句，表示了對其祖的尊崇。魏繇用「搏桑」即日本作為吟詠甲午戰爭的詩題，詩中有日本國勢如日初升的稱詠，勸諫當政者不要徘徊再誤，實也有仿日自強的蘊意。如所周知，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於檢討清朝在法度、官制、學校、兵農等方面的問題後指出：「方今當數十國之覬覦，值四千年之變局。……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上；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又說：「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¹⁴應該認為，黎汝謙、魏繇等上述官員士人在吟什中所表達的看法和心聲，正是康有為等維新派在〈公車上書〉中主張效法日本變法的社會思想基礎。

¹³ 周鐘嶽：《惺庵詩稿》，卷一，頁五；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民國元年(1912)鉛印本，頁二十三；阿英(編)：《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頁122；袁嘉穀：《臥雪堂詩草》，〈九龍池集〉，頁二十八；黎汝謙：《牢溪生詩稿》，手寫本。

¹⁴ 邵軫：《後山詩稿》，載阿英：《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頁74；《牢溪生詩稿》；魏繇：《邵陽魏先生遺集》，民國壬申年(1932)建德周氏影印本，頁二十五、二十六；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冊，頁122，136。

二、「聞說山河要分裂」，「應合民權救我疆」

戊戌維新是一場以愛國救亡為直接動因的「學習外國改革政治」的運動。「公車上書」後，康有為聯絡帝黨文廷式等京朝士大夫數十人成立了以陳熾為會長的強學會。他有紀事詩，請看以下詩句：「山河已割國搶攘，憂國諸公欲自強。復社東林開大會，甘陵北部預飛章。」康自比於明末東林復社士人的集社，並記稱：「割臺行成後……同開強學會於京師，以為政黨嚆矢，士夫雲從。御史褚成博與大學士徐桐惡而議劾。」¹⁵ 其時福建安溪林鶴年也有〈書強學會〉詩，寫道：

部洲五大論強學，滄海靈鯨一柱擎。萬派根源歸學海，千秋擔荷屬儒生。道原經術通時務，兵協戎機審國情。何待楚材資晉用，二三豪傑答升平。¹⁶

林鶴年，舉人出身，甲午戰爭前幾年去臺灣承辦茶釐船捐等局，後籌辦全臺鐵路。甲午戰爭中在臺灣抗日，失敗後內渡返鄉。他在詩中盛讚京朝士大夫放眼「五大洲」，講論強國之學，「通時務」，「審國情」，肩負救國重擔。可見他是強學會在福建的支持者。

戊戌維新走向高潮的導火線是膠州灣事件。膠州灣事件以及由此而起的割地狂潮使甲午戰後激發起來的民族救亡意識進一步升華。對當時德、俄、英、法等國強索租借地的侵略行徑，安徽懷寧舒鴻貽有組詩紀其事。這些詩的題目是〈德國以教士二人在山東被戕，佔據膠州灣，明年與訂租膠州灣條約，以九十九年為期〉、〈俄據膠州灣租借成約，援利益均沾之利，要求旅順大連灣簽定租借條約〉、〈旅大既訂租約，是年六月，法以保護越南為名，要求簽訂廣州灣之約。而英之租借威海衛契約，亦於七月簽訂〉。他在詩中發出了沉痛的哀嘆：「後患從此滋，前例無可擬（租借二字在國際法上鮮有先例）。……嗚咽淚滂沱，難湔削地恥。」另外，廣東新會林文聰也有紀事詩〈英人既拓九龍界並索築路權〉、〈外人連年脅租膠州、旅順、大連、威海、九龍、廣州灣諸租界〉等多首，哀嘆：「國力傷哉終不振，港灣存者已無多。」膠州灣事件後充滿這樣危亡感的紀事詩還有很多。江蘇山陽（今淮安）徐嘉有〈聞膠州警〉，浙江烏程（今湖州）秦福基有〈聞膠州近事書感〉。江蘇梁溪（今無錫）蔣士超（字百里）有〈感事〉三首，其中吟詠道：「俄虎英獅總禍胎，列強互制暗相猜。」「劃後鴻溝餘漢土，市殘駿骨剩燕臺。」「悵望中原四百州，山河破碎使人愁。日回大地難成曉，氣肅胡天總是秋」。¹⁷

¹⁵ 《萬木草堂詩集》，頁63。

¹⁶ 林鶴年：《福雅堂詩鈔》，《萬梅集》，頁十。

¹⁷ 舒鴻貽：《宜園詩稿》，頁三、四；林文聰：《避庵詩存》，卷上，頁五、六；徐嘉：《味靜齋詩存》，民國壬申年（1932）上海中華書局仿宋版，卷九，頁十四；秦福基：《玉壺天詩錄》，頁六；蔣士超：《振素庵詩鈔》，宣統元年（1909）刊本，卷二，頁四。

膠州灣事件後中國遭受的民族屈辱是嚴重的。維新派人士黃遵憲在〈書憤〉中這樣概括了陸危的局勢：「一自珠崖棄，紛紛各倣尤。瓜分惟客聽，薪盡向予求。秦楚縱橫日，幽燕十六州。未聞南北海，處處扼咽喉。」「弱肉供強食，人人虎口危。無邊畫甌脫，有地盡華離。爭問三分鼎，橫張十字旗。波蘭與天竺，後患更誰知！」¹⁸林則徐的長孫林賀峒在〈膠州感事〉中表達了這樣的悲憤：

寇氛遽已塞滄溟，眼前膠西失翰屏。十萬空磨延廣劍，五千未涉單于庭。和戎無利猶師絳，誰將諸賢合憶青。聞說山河要分裂，悲筳永夕不堪聽。¹⁹

福建汀州（今長汀）人、宗室寶廷的弟子康詠在其〈雜詩〉中則高呼民族救亡：

美人掣我肘，歐人扼我喉。俄人拊我背，倭人摧我頭。蒼天構奇禍，凌遲到神州。英雄恥任運，誓志完金甌。安知非啟聖，先之以殷憂。黃種四萬萬，慎勿忘國仇！²⁰

黃、林、康的詠述，把中國將變成波蘭、印度的前景和一幅血迹斑斑的瓜分圖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危局和困境，西方史學家曾作過這樣的評論：「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擁有中國十分之一的領土和人口的國家，曾經遭到過中國1897年11月到1898年5月這六個月中所遭到的那樣一連串的屈辱。我們不妨補上一句，也沒有一個國家在行政上的那些公認弊病的改革方面，在具有很多優良品質的堅強民族所居住的一塊極其富庶的土地上一切資源的組織方面，曾經表現出這樣的無能。」當時一些正直的官員和士人對清廷在內政和外交方面的腐敗與無能是非常憤懣的。軍機處章京陳熾在強學會改為官書局後仍「用事」，他在〈感事〉中有這樣的憤慨：「徙薪不及早，燭火能燎原。……當斷不能斷，揖盜徒開門。」時任廣東學政的張百熙在〈秋感〉中，表達了這樣內憂：「未信東南物力微，連雲番舶駛如飛。農商交病民生索，盜賊公行吏事非。」四川富順劉光第是進士出身，時任京官。他在甲午年寫的〈萬壽山〉中，用「膏血為塗丹，皮骨為版築」等詩句揭露清廷腐敗，竟挪用海軍經費造頤和園。他又在戊戌年前夕寫的〈京師蔬菜漫賦〉中記詠家鄉四川的災情，發出這樣的感嘆：「飽食長祝太平年，不識國危顛可憐。草根樹皮食已絕，故里哀鴻眼流血。」江蘇陽湖（今常州市）士人潘振華在戊戌年初所寫的〈重有感〉中作這樣的感嘆：「從此憂生事，強夷覬覦多。先時機已失，當軸意如何。國已空杼柚，賢宜假斧柯。聖明宵旰

¹⁸ 黃遵憲（著）、錢仲聯（箋註）：《人境廬詩草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下冊，頁767，772。

¹⁹ 林賀峒：《味雪堂遺集》，宣統元年（1909）刊本，頁六十五。

²⁰ 康詠：《漫齋詩稿》，1918年石印本，頁六十六。

揚，誰與鎮山河？」江蘇江寧（今南京市）舉人陳作霖在膠州灣事件後所作的〈感憤〉詩中這樣寫道：「南洋與北洋，膠實扼中央。……樞府無奇策，紛紛只議和。……法亦無從變，事真不可為。富強皆夢囂，文武總兒嬉。……野人無遠慮，概誦楚茨詩。」²¹ 他因痛感國土被割而朗誦運用「思古」方式譏切時政的《詩·小雅·楚茨》篇，顯然是為了表達要求變法救亡的心聲。

到戊戌年，要求變法的呼聲已非常強烈，以致在庭院閨閣中也有反應。湖南蘄水郭筠在她所寫的〈有感〉中這樣吟詠道：「轉電時聞警，妖氛日跳樑。陸鄰頻割地，輪帛屢傾囊。四海瘡痍苦，連年水旱荒。寰輿非樂土，宵旰意徬徨。官守勞存問，軍需待計量。……變法心逾激，偷安膽未嘗。未遑驅劣馬，先已告亡羊。涸轍難紓困，危邦若探湯。婦嬰應共憤，賢哲盡凋傷。……煉石終期補，揮戈引領望。」²² 郭筠，字誦芬，曾國藩子曾紀鴻之妻，其長子曾廣鈞，光緒己丑年（1889）進士，官廣西知府。乙未年參加北京強學會。其次子曾廣銓，幼年時承嗣給伯父曾紀澤，後隨同赴歐在法國讀書，十六歲歸國。丁酉年（1897）與葉瀚、汪康年在上海創辦《蒙學報》，鼓吹啟蒙民智。郭筠在詩中表達的對外患內憂局勢的擔憂，憧憬天子大開「明堂」「變法」，表露了庭院深處婦女的共憤和心聲。稍後，狄葆賢在《平等閣筆記》中，述及他在遼陽旅店中看到一女子的題壁詩，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正如梁啟超所認為：「讀之亦可見女權消息之一斑。」²³

「五洲大變榛狃俗，喚起人間瞋睡魔」。甲午後維新派為了從根本上實現民權變革，極力通過開學會、辦報紙，進行開啟民智和改變陋俗的宣傳。鄭觀應在《羅浮待鶴山人詩草》中有〈不纏足歌〉，記詠了不纏足運動由粵、湘向上海的推開。1897年7月，梁啟超、譚嗣同、汪康年、康廣仁等在上海發起不纏足會，於《時務報》刊布章程。²⁴ 鄭觀應此歌便寫於此時。另外，林紓因用古文譯述歐美小說而名於時，他也曾用詩進行思想啟蒙的宣傳。他1897年所撰〈閩中新樂府〉三十二篇是因「聞歐西之興，亦多以歌訣感人」而作，勸喻激士氣、重武臣、興女學、不纏足、重習藝、禁鴉

²¹ 馬士、宓亨利：《遠東國際關係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下冊，頁412；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卷一百七十四，頁二；張百熙：《退思軒詩集》，宣統二年（1910）武昌刊本，卷五；劉光第：《介白堂詩集》，光緒癸卯年（1903）宜賓儷嶺書屋刊本，卷下，頁四十四；潘振華：《鷗舫詩文鈔》，民國甲子年（1924）上海刊本，卷二，頁二十八；陳作霖：《可園詩存》，宣統三年（1911）刻本，卷二十，頁三。

²² 郭筠：《藝芳老人詩存》，宣統二年（1910）上海鉛印本，頁九。

²³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3。

²⁴ 唐才常：〈失題〉，載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61；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07；《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下冊，頁801。

片、知時務、改營制、倡實學、重養蒙等。如〈村先生〉對「村先生，貌足恭，訓蒙〈大學〉兼〈中庸〉」進行了譏諷，歌詠說：

我意啟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說明豁：論月須辨無嫦娥，論鬼須辨無閻羅。勿令腐氣入頭腦，知識先開才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從容易入聖賢道。今日國仇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兒童讀之涕沾襟。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與辟雍，強國之基在蒙養，兒童智慧須開爽，方能陵駕歐人上。

他在〈興女學〉中歌詠道：「興女學，興女學，群賢海上真先覺。果立女學相觀摩，中西文字同切磋。……母明大義念國仇，朝暮語兒懷心頭。兒成便蓄報國志，四萬萬人同作氣。女學之興係匪淺，興亞之事當其成。」在〈知名士〉中「嘆經生詩人之無益於國」，作出「解否暹羅近漸強，一經變法生民康」的發問，勸喻經生名士勿再「作夢」，應講求「變通」。²⁵ 林紓在政治上不能算是維新派，後來的思想又保守。但在膾炙人口的《閩中新樂府》中，其思想啟蒙乃至變法救亡的說教躍然於紙上。可以這樣說，除了康、梁、譚、嚴等維新派外，在戊戌維新運動中不少士人都不同程度地鼓吹啟蒙與變法。這正是變法維新運動能夠走向高潮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思想動因。

戊戌維新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是洋務運動中孕育的早期維新思想的發展與升華。「公車上書」不久，光緒帝飭總理衙門將鄭觀應《盛世危言》刷印兩千部分送臣工閱看。後又翻印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和湯壽潛的《危言》等書，命部卿寺堂司各簽注意見。浙江杭州士人、八千卷樓主丁立誠在戊戌〈雜感〉中有「校邠抗議太紛紜，盛世危言樹一軍」的記詠。江西新建人、戊戌進士程道存在〈讀校邠廬抗議湯子危言〉詩中歌詠說：「馮湯感事變，治國用刀圭。……朝廷亟變法，簽注命曹司。」²⁶ 這表明早期維新思想在戊戌維新中仍有其影響，也說明戊戌維新與早期維新思想有思想上的連續性。

「追蹤能否遷地良，但願自強聖天子」。²⁷ 維新變法運動進入戊戌年，維新派通過帝黨官員開始了與光緒帝直接溝通。公車上書後的兩個月間，康有為又兩次上書，只有第三次上書能夠上達，光緒帝表示讚許。1897年12月膠州灣事件起，康有為趕到北京，第五次上書，籲請採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並請國事付國會議行，請頒行憲法。次年1月24日，光緒帝命王大臣延見康有為於總理衙門。1月29日康有為上〈外憂危迫，分割洵至，宜大誓臣工，開制度新政

²⁵ 林紓：《畏廬詩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32年）。

²⁶ 丁立誠：《小槐窠吟稿》，1919年刊本，卷四，頁八；程道存：《可乎不可乎不可軒詩草》，民國辛酉年（1921）鉛印本，卷上，頁三十四。

²⁷ 《臥雪堂詩草》，頁二十二。

局摺〉。旋又第七次上書。接著，在北京立保國會，略具政黨規模。但很快遭到頑固派的彈劾。光緒帝說：「會名保國，何罪之有？」乃得免。康有為有詩紀其事：

八表離披割痛傷，群賢保國走彷徨。從知天下為公產，應合民權救我疆。八俊三君自鉤黨，周鉗來網巧飛章。書門幸免誅臣罪，明聖如天賴我皇。²⁸

三君、八俊，東漢末年反對宦官專權的陳蕃、李膺等有名望的士大夫，喻指保國會人士。周鉗來網，武則天時的酷吏周興和來俊臣張設的鉗制和陷害忠良的羅網，喻指上書誣陷保國會人士的頑固派。詩意是，士大夫痛心邊疆被割，為保國繁忙奔走，向來知道天下是大家的道理，應該合國民固有之權來保救天下。雖然頑固分子急上奏章誣陷，但因皇帝聖明得以幸免。

戊戌維新是一場高舉仿日旗幟的政治變革運動，根本大旨是提倡民權，最終行君主立憲。但到戊戌年間康有為等維新派與光緒帝得到溝通後，又提出「乾綱獨斷」，希望光緒帝能「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治譜」。這種希望實代表了許多士人的共同看法。膠州灣事件後，浙江烏程（今湖州市）士商李世伸寫有古樂府〈俄羅斯〉一首，詠及：「俄王大彼得，即位才十七。能將陋習除，忘尊學藝術。庶政倣歐西，法變恐不疾。創出海軍雄，遂與大邦匹。」另外，安徽歙縣諸生洪汝怡作〈日本東都雜興詩〉，歌詠日本「一自歐羅新政闢，廿年雄長大瀛東」。²⁹ 實際上，從林則徐和魏源在《四洲志》和《海國圖志》中盛讚彼得微服赴西歐習藝歸而變政強俄以後，中國講了六十年大彼得的故事。至於日本，從洋務運動起，李鴻章就有欽羨日本的思想，王韜、黃遵憲、鄭觀應等有早期維新思想的人士，更有讚美日本「開議院」的言論。³⁰ 但直到甲午戰後，特別是戊戌年，康有為向光緒帝進呈《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以後，近三十年的「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的聲浪才衝破「習俗」，成為有實際意義的政治變革波濤。鄭觀應在〈讀《俄彼得變政記日本明治變法考》有感〉中歌詠道：

證今考古事推枰，英主何曾泥守成。天以艱難資振奮，世將中外合升平。臥薪嘗膽師勾踐，撝舊維新企漢京。此際朝廷求變法，可如俄日力經營。

另外，鄭觀應在有關詩什中，多有這樣的吟詠：「歐洲議政院無私，究竟君民共主宜」、「日本與議院，公論如秉炬」、「事非集眾思，淑慝恐難辨。下情得上達，大哉

²⁸ 《萬木草堂詩集》，頁89。

²⁹ 李世伸：《屈翁詩稿》，〈秦西新史雜詠〉，頁三；洪汝怡：《寄蓀詩存》，卷一，頁十。

³⁰ 參見劉學照：《洋務思潮與近代中國》（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年），頁287-89。

議政院」、「急求立憲開民智，上下同心撫字仁」。³¹可見，鄭觀應在政治上雖未參與戊戌維新，但在思想上是贊同仿倣俄日變政的。他傳韻在詩什中的「開議院」、行「立憲」言論除了語氣平和外，同康梁維新派的民權思想大體上是膾合的。

三、「嚴敕頒新政，疆臣猶舊謨」

百日維新是戊戌維新運動的高潮。或由於其來也匆匆，去更匆匆，在眾多清季詩什中竟很少見有正面反映其具體經過和舉措的記詠。湖南瀏陽士人劉兆涵所寫〈戊戌時事六感〉稍詠及此事，試錄最後兩首：

海內新機激便開，求賢館築仿金臺。東山人往微言絕，西法工兼眾智裁。變計力圖多難日，問心誰是不凡材。篤行有序先明辨，徒尚紛更萬事灰（變法）。

（其五）

官禮煌煌萬古垂，自來經世有成書。致和格物皆聖教，好學深思賴後賢。西土尚知宏製作，中才何竟域柔愚。果能此道砭孱弱，葆我強明絕覬覦（觀成）。

（其六）³²

劉兆涵時年已七十歲。雖然老人仍不脫經世思想的窠臼，對變法步驟的急切或有保留，但他認定維新變法是「海內新機」激發而成，贊同採用「西法」、「力圖變計」、宏揚「製作」、去除「柔愚」，很大程度上表明他是戊戌維新的贊同者。

「維新與守舊，朋黨分其途」。³³自公車上書以來，特別是頒布〈明定國是〉詔以後，維新變法運動中充滿新舊之爭和帝后黨權力之爭。一個顯著的事例是，詔定國是後四日，即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緒帝師傅翁同龢被開缺回籍。關於此事，時人的記載和史家的評述向有異議。一般認為這是由於后黨的排斥傾軋，也有以為主要是出自光緒帝的本意，認為戊戌春三月以後翁從支持變法轉為壓制維新派，「說慈禧強迫光緒諭黜翁同龢的說法，缺乏歷史根據」。³⁴但就康有為來說，他對翁師傅一直是懷有深情的，翁被黜後，他有〈懷翁常熟去國〉詩：

³¹ 《鄭觀應集》，頁1311-12，1291，1300，1329，1360。

³² 劉兆涵：《存知堂詩集》，民國十六年（1927）仁和石印局刊本，卷中，頁四十四至四十五。

³³ 章鐘亮：〈哀京官〉，載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六編，下冊。

³⁴ 孔祥吉：〈光緒與戊戌維新運動〉，載《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述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02。

膠州警近聖人居，伏闕憂危數上書。已格九關空痛哭，但思吾黨賦歸歟。早攜書劍將行馬，忽枉軒裳特執裾。深惜追亡肅相國，天心存漢果何如。³⁵

詩意是記詠膠州灣事件後，他屢次上書不達準備回鄉講學，翁屈尊造訪「執裾」留行，比況於當年肅何追韓信的故事，對翁回籍深感惋惜。翁被逐後也有〈將之江右視筱珊侄〉詩：「海程行過復江城，無限蒼涼北望情。傳語蛟龍莫作劇，老夫慣聽怒濤聲。」³⁶抒發了「北望」的「無限蒼涼」而又準備平靜對待的感受。

翁的去國，帝黨官員是頗為依依的。總署章京李岳瑞在所撰《春冰室野乘》〈記翁協揆去國〉篇中，引朱祖謀《彊村詞》中〈丹鳳吟〉一首，該詞韻繪「別腸寸寸」、「已是一江潮落」的情景。³⁷但是，非帝黨官員的對此事卻別抱情懷。請看江陰士人張洵佳〈紀某師傅事〉二首：

真個黃梁入夢中，一生遭際竟全空。雷霆震厲乘時降，甲第恩榮到此終。江陵死後才騰謗，白髮當朝較勝公。(其一)

摸索人才在暗中，辨奸無識愧蘇公。殺身忍使三良殉，造膝難將九陛蒙。罪案一朝終坐實，師恩兩代盡翻空。文端肖子文勤弟，老向江湖作釣翁。(其二)³⁸

張洵佳，字少泉，生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優貢官至河南知縣。因受袁世凱的援引而得到快速升遷的徐世昌為其詩鈔作序並自稱「門下士」。張詩充斥著嘲諷貶責之詞，喻諷翁的結局連張居正也不如，實代表后黨以及一般反維新人士的態度和心聲。

戊戌維新期間的變法措施遭到了后黨和頑固勢力的抵制和反對。一些號稱開通的洋務大員也是從旁觀望，靜待太后臉色行事。所以，一系列變法詔諭難以推行。光緒帝雖說親政，但仍需時時秉承「懿旨」。僅「百日維新」期間，赴頤和園「請安駐蹕」凡十二次。³⁹維新派著名人士張元濟在〈追述戊戌政變雜詠(有序)〉中詠及：

帝王末世太酸辛，洗面長留涕淚痕。苦口叮嚀宣國是，憂勤百日枉維新(當時內侍，亦尚有忠於德宗者，如寇良材之徒，嘗對人言，德宗在宮內，每於無人獨坐之時，頻頻嘆息，掩面而泣。又言西后性情暴躁，對於德宗一言不合，即責令長跪不起，故德宗入覲問安時，覲棘萬狀)。⁴⁰

³⁵ 《萬木草堂詩集》，頁90。

³⁶ 翁同龢：《瓶廬詩稿》，光緒乙巳年(1905)刊本，第三冊。

³⁷ 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363。

³⁸ 張洵佳：《愛吾廬詩鈔》四編，宣統二年(1910)鉛印本，頁十。

³⁹ 《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下冊，頁807。

⁴⁰ 《戊戌變法》，頁352。